

何生活在人与人共在的世界之中,人文教育的过程就是要人与人的生动交往,激活人文知识背后的精神指涉,在人文知识的引领中,让人文精神生动地活化和在人与人的交往之中,活在人与人的友爱之中。换言之,如何在人文教育的过程中,把人文知识还原到人与人的交往世界之中,乃是人文教育过程的中心。

弗洛姆在论及爱的艺术时这样谈到:“只有当我自己达到独立,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独立地走自己的路,即不想去控制和利用别人,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尊重对方才成为可能。只有在自由的基础上才会有爱情,正像一首古老的法国歌曲中唱的那样,‘爱情是自由之子,永远不会是控制的产物’。”^[1]一个人何以成为一个富于且能践行社会关怀的个体?只有当其自身成为一个独立、自由、丰富而富于创造性的人,才可能真正成为深入而切实地关怀社会的时代精英,成为在公共生活中不断追求自我存在之卓越的优秀公民。尊重每个人的独立性,扩展个体交往的自由空间,激励人与人之间的友爱,让个体真实地活在他人之中,以增进人与人的共契,这是人文教育实践的靈魂。

陈丹青曾讲到他女儿在美国读大学的经历:“她到了大学,要选六门课,其中有一门就是《神曲》,结果来了个老头子,这个老头子教了一辈子《神曲》,将近40年。他会讲维吉尔带但丁游地狱,游完以后要

到天堂了,维吉尔就消失了。老头子每次讲到这里都会泣不成声,在课堂上大哭起来,这就是我说的善良。他讲了40年,重复了上千遍,可每次讲课还会受不了,眼泪喷出来,这就是教育。”^[2]这个案例提示我们,人文教育实践展开的基础无非是两个,一是蕴含人文教育旨趣的人文经典,也即“文”;二是受过良好人文教育的教育者,也即“人”。人文教育实践终究是通过受到良好人文教育、拥有人文趣味的人来进行,这是人文教育的本体支撑。换言之,人文教育始于教育者自身的属人化,努力让自己成为人意义上的人,并且在教育过程中活出这种属人性。人文教育的本体依据提示我们,人文教育之可能性,首先在于人文教育者自身把自己当人。直白地说,人文教育的根本依据乃是那些自身有着丰富的人文素养、活出自己的人文姿态的人。这意味着就当下中国的人文教育现实而言,最要紧的出路就是如何提升教师的人文素养,以及培养出富于人文素养和人文情怀的年轻教师。

参考文献:

- [1]弗洛姆.爱的艺术[M].李健鸣,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26.
- [2]邓康延,梁罗兴.盗火者:中国教育革命静悄悄[M].北京:新星出版社,2014:213.

为何人文?如何教育

陈高华

(大连理工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人文互动而相益,谓之教育。

我们身处的时代,是一个功利和实用支配下的技术化、市场化时代,背后的资本逻辑所促使的专业化分工,已然使教育变成趋向功利和实用的专业教育。可以说,现代大学的发展,就是专业教育兴起、人文教育式微的一个过程。我们不难见到,大学里频频新增的专业,无非是适应市场需求而设置的社会工种,它们不断地挤压着作为大学之本的基础性学科,以至于如今大学里所谓的人文学科不得不变成一种专业而交给“功利和实用”的市场规则来评断,成了一种有人文之名而无人文之实的冷门专业。于是乎,

那些天然地具有实用性的理工科专业师生对人文学科专业师生的不屑甚至鄙夷,就成了一个司空见惯的现象,它不仅存在于个别的理工科专业师生那里,甚至是理工科大学的一条显而易见的操作规则。更令人惊诧的是,据说有些理工科大学之所以办人文学科,竟是为了解决理工科男生找女朋友的问题^[1]。奇哉怪哉,人文学科竟是理工科的“后宫”!在此背景之下,如下吊诡的情形也就变得可理解了:我们越是呼唤人文教育,人文教育的处境就越是艰难,就越难有伸展的空间。

既然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是我们的时代精神,

既然资本是我们的时代精神的支配性逻辑,那我们为何不顺其精神、按其逻辑,让人文消失于专业之中,任文、史、哲这些源远流长的教育门类在市场中苦恼于自己存在的正当性,反而还要“西西弗斯般地”呼唤人文教育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先看看贵州大学校长郑强在2015年两会期间回答记者的一个说法:“现在我发现很多理工科学生没有情感,连孝敬父母的情感都没有,这是很恐怖的。教育回归常态,就是让人回归人样。”^[2]结合现实的情形,我们从这个说法中可以看到,理工科学生尽管可以在专业领域获得高精尖的能力,却往往丧失掉了人之为人的一些基本情感。我们甚至可以说,理工科这种过度实用化的专业教育“不仅不是在培养人,而且是在加速人的物化,实际上是在扼杀人”^[3]。换言之,专业教育实际上背离了教育的成人旨趣,成了一种空有教育之名的专业培训。实际上,我们可以说,郑强校长的这个说法极为简练地表达了教育与人之间的内在关联,而这应是教育的常态。

换言之,我们之所以呼唤人文教育,首先一点就是针对现代社会中的专业教育之弊,重新唤起人们对何谓教育之本然的意识。在古典时期,无论中西,教育皆以塑造人性、造就理想人格为其目的,是地地道道的人文教育。大学在中世纪的出现,也是呈现为一种人文主义机构,是人文精神的制度化,使此前在历史中徜徉的人文化成活动逐渐具有一个稳定性的空间。只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劳动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上升,诸种不同形式的教育才加速度地变成了以就业为导向的专业培训,大学也变成了职业培训所、文凭颁发地,又或者是企业的技术研发部。即使如此,人们仍模糊地持守着教育的“树人”向度。因为,尽管我们如今把专业技能的培训称为教育,甚至是大学诸种不同学科中的热门专业,但我们还不至于把教人如何偷窃、杀人、钻法律空子看成是教育。原因何在?这并不是因为上述种种在社会中没有市场,而是人们对于教育仍隐隐约约地希冀着一个向善的维度。这一点则是源于我们“每个人都拥有和其他人同样的原始善性”,而“原始感觉的善性是不可剥夺的”^[4]。这就是说,若打落掉时代附着于教育上的种种装饰,回到教育的本源,我们会自然地把“向善成人”看做教育的本性所在,它既是教育出发的动力,也是教育要达至的目标。

其次,现实地来看,我们呼唤人文教育是为了安顿人心、传承文明、养成共同感,是所谓“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正如康德在阅读卢梭之后所发现的那样,专业教育的错误在于,把知识甚至是技能当做价

值判断的标准,交出了人的自主性,任凭市场的需要来标注自己的价值(实为价格)。人文教育则因其关乎精神、眷注成人,通过唤醒自我意识、强调自由意志而能安顿人心。因为,人文教育无论是通过内在的修养和践行,还是寻求外在的普遍之物,都在于确立和塑造自身的人格和价值观念,或者说,人文教育并无明确的外在目的,而在于自身的活动展开,因此,它必定造就一种独立的人格。这种具有独立人格的人,当然是一种有教养的人。因为,人文教育常常是朝向经典的人文互动,通过这一朝向活动,人因经典而得到滋养,经典因人的阐发而熠熠生辉。在这种人文互动的过程中,文明就这般地从过去流淌了过来。此外,一个民族、一个共同体的经典,总是有限的,它们凝聚了一个民族、一个共同体的精神和文明,当人们在人文教育中一遍遍地朝向这些经典,在这些经典中来回往复,与之亲熟,自然而然就会养成一种共同感。由此可见,人文教育看似没有眼前的实用性,却贯穿着一个民族、共同体的文明。这在如今这个全球化的时代至为重要,人文教育可以说是使人们获得自我认同、文化认同以至国家认同的关键要素。正如甘阳所言,如果我们在大学中受教育的学生对生养、培育自己的这片土地一无所知,对其所蕴含的深厚文化没有一种认同感,对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甚至自己的亲人没有一种同情之心,反倒是由陌生而冷漠,由冷漠至残酷,那就是我们中国人自身存在的危机,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危机^[1]。

那么,我们应如何进行人文教育呢?当然,从大的方面来讲,应该要有制度的保障,使大学以及各类教育机构能够给予人文教育自身的存在地位,而不是处于一种寄生性的地位,如此人文教育才不至于因市场化浪潮而变成一种苦苦挣扎的冷门专业。同时,要进行观念上的塑造,使社会形成一种崇尚人文的氛围,懂得人文在构建价值共识上的地位。当然,这些都超出了个人的能力范围,不是一时能够完成的。不过,我们大学中从事人文教育的学者,也应践行人文教育的要求,而不能一方面哀叹人文教育在大学中的式微,另一方面却又主动地“自我殖民”,使人文教育专业化,向理工科献出自己。我们清楚,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但也不是说特别艰难,它需要的只是以人文学者自许的教师对于自己身份的自觉。就笔者个人而言,作为大学中人文学科的教师,笔者坚持在教学中强调人文之为教育的本然,强调对经典作品的阅读和敬畏;此外,力所能及地举办读书会活动,阅读历史上的经典作品。笔者以为,人文学者定期地举行读书会,与同学一起阅读经典作

品,是一种极好的人文教育实践。

首先,无论是孔子与众弟子们的教学场面,还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学园,都可以说是我们今天读书会的典范,而且,大学最初就是一些如同读书会般的学术团体,它逐渐地发展成为行会,由此而形成大学。换言之,从当下的现实来看,我们在专业化盛行的大学里头,举办读书会,阅读经典,就类似于在中世纪教会统治下,一些有志于学术和自由的学者走出教会,邀集同道探讨学问。当然,我们也不难明白,在此氛围之中,人们不仅是在砥砺学术,也是在示范一种生活方式。

其次,读书会阅读的是经典作品,经典作品是人类文明的结晶。因此,读书会是在自觉地传承人类文明,使人类文明经由自身流传下来,也使自身受到文明的滋养而变成一个文明化的人。这样一些经由文明滋养的人,就不会因现代资本社会的专业化分工而撕裂,因为他们都有一个可共同朝向的文明,有自己的根。换句话说,读书会的成员已经在读书会中养成了一种共同体感,有足够的力量去弥合现代社会中的原子化情状,而不至于完全追随资本无根漂流。

最后,就读书会的具体情状而言,读书会这个“会”,第一层意思是“聚在一起”,就是大家在一起读书,这在当下连老师都已然叫喊着要“冲出书斋”的大学里,实在不易,但这恰恰是以人文教育期许自身的教师应有的姿态;第二层意思是“体会”,即大家在

阅读经典时要有自己的体会,要使自己与经典接通;第三层意思则是“会一会”,即要把各自的体会拿出来,相互较量一下,在这里学会与不同的观点看法打交道,如何去倾听和尊重不同观点;第四层意思是这种较量并不是为了“争胜”,而是为了“生成”,生成一种既不属于我也不属于你而属于我们的东西,由此达到“会通”效果。在这里,读书会通过朝向经典而意识到自己,通过把自己呈现出来而意识到他者,通过与他者在意见上的来回往复养成一种共同体,并由此示范了一种生活方式。恰如康德所言,人文学者应该坚信,我们的责任是造就人格而非制作书本,是示范行为间的秩序而非占据高位。总而言之,一种合宜的生活方式才是人文学者应当期许的杰作^[4]。

注:该文得到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3CKS031]和大连理工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DLLT13RC(3)64]的资助。

参考文献:

- [1]甘阳,陈来,苏力.中国大学的人文教育[M].北京:三联书店,2006:226-6.
- [2]郑强.很多理工科学生没有情感,很恐怖的[EB/OL].http://www.guancha.cn/Education/2015_03_07_311396.shtml.
- [3]陈高华.经典就是教育本身[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4(2):5-7.
- [4]曼弗雷德·库恩.康德传[M].黄添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10-53.

书院作为现代社会通识教育的形式:以古典书院为例

柯小刚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毋庸讳言,今天讨论教育问题的背景是,现代大学已经堕落为职业培训公司和学术工业制造公司。在学生眼里,学校理所当然就是就业培训服务机构;在学校眼里,教师是雇员,学生是客户上帝,监管雇员为上帝服务成为大学管理的主要工作。理工科的研究生管导师叫“老板”,更是直接暴露了现代大学的本质。现代大学已经丧失了教育的古老责任。这是近年来大学古典通识教育和民间传统文化通识教育兴起的背景。

在大学古典通识教育方面,刘小枫和甘阳作出

了开创性的贡献。中山大学博雅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古典班、重庆大学博雅学院、清华大学新雅学院相继开办,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形成了可供借鉴推广的模式。2015年11月27日至29日在重庆举行的“中国比较古典学学会第三届年会”以“《理想国》的教学与研究”为主题,有百余名古典学者和一线大学古典通识教育教师参加,展现了大学古典通识教育开展的盛况。不过,这些古典通识教育实践仅限大学体制内,有待面向更加广阔的社会空间展开。

另一方面,民间传统文化通识教育近年来也开